

华侨传奇人物

陳嘉庚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TAN KAH-KEE

杨进发 著 李发沉 译



陈嘉庚纪念馆
Tan Kah Kee Memorial Museum

华侨传奇人物

陳嘉庚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TAN KAH-KEE

杨进发 著 李发沉 译

陈嘉庚纪念馆

陈嘉庚纪念馆

83420426



陈嘉庚纪念馆
Tan Kah Kee Memorial Museum

目录

作者的话	/ 1
前言	/ 3
导言	/ 5
第一章 历史背景	/ 9
第二章 陈氏家族	/ 19
第三章 一个企业家的崛起	/ 37
第四章 卓越社会地位的建立	/ 71
第五章 从帮领袖至社会领袖——陈嘉庚的实力地盘	/ 105
照片	/ 139
第六章 从社会领袖至政治领袖——统率中的陈嘉庚	/ 155
第七章 北方红星与南方神风——蜕变中的陈嘉庚	/ 195
第八章 政治挂帅——华侨旗帜飘飘	/ 237
结语	/ 273
中文参考资料	/ 278
英文参考资料	/ 282
著者简介	/ 291
后记	/ 293

作者的话

拙著《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叻、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第二版），为新加坡李发沉翻译成中文本，由八方文化企业公司于1990年出版。此1990年版本，今庆幸为集美陈嘉庚纪念馆再版，以资纪念新马教育史上的两位大功臣陈嘉庚与林连玉。前者倾资兴学名满天下。其创业，社会改革，政治领导与工商业王国的思想、精神与实践，足令炎黄子孙敬佩与学习。后者为维护大马华文教育生存而鞠躬尽瘁，青史留名。林连玉，早年集美师范学校毕业，是我就读吉隆坡尊孔中学时的恩师。

拙著在集美出版，曾获得新加坡陈嘉庚孙女陈佩仪（Peggy Tan）与八方文化企业公司主人潘国驹教授的鼓励、陈嘉庚纪念馆馆长陈呈的首肯与该馆出版部工作人员的鼎力支持，谨以在此致以崇高的敬礼。

澳大利亚
杨进发识
2012年5月31日

前言

倘若史料欠缺又想完成一部战前华族名人传记的撰述工作，恐怕不是一件易事；而有关陈嘉庚（一八七四至一九六一）的传记却相对的容易的多。盖陈氏本人、家庭及有关的档案记录等原始资料，至今仍大量保存。

本书之酝酿与构思始于一九七六年。当时我客在伦敦从事新加坡华人领袖及华人势力的历史研究。自那时起，我即在伦敦、新加坡间往返共达四次之多。我拜访了许多与陈嘉庚关系密切的人士，借以掌握这一位集工业家、慈善家、厦大倡办人、社会政治领袖、毛泽东挚友、蒋介石宿敌等多重身份者的一切资料，包括奇闻轶事。我荣幸地获得各方的热诚合作，遂使本书得以顺利付梓，隆情厚谊，感铭不已。我所采访的对象包括如下人士：佐顿（已故，当时居住在诺登汉），战前新加坡华民政务司；B. C. CORRIDON（现居 SURREY）；孙崇瑜，战前新加坡华民政务司署华人帮办；林戊巳（已故）；何葆仁博士（已故）、陈维龙（已故）、陈育崧（已故）、黄奕欢（已故）、潘国渠、陈国庆（陈氏五公子）、陈共存（陈氏侄儿）、陈赐曲、陈天锡、孙炳炎、苏君亮、胡少炎等几位，他们现全居住在新加坡。一九八四年，我到中国跑了一趟，在受访人士中，四位是陈氏生前挚友，如现居集美的陈村牧、居于北京的莊明理、张楚琨及洪丝丝等。他们对我的采访，其中包括涉及私人生活和事业情况，皆不吝提供，可谓有求必应，令我深深感动。在新加坡的孙崇瑜老先生更对我滔滔忆述当年英殖民统治与华侨社会的情况，其中不乏他与陈氏交往及他个人迷人事业的陈述，是项采访可耗了他老人家不少时间、精神，可是他始终不以为忤，真是难能可贵，陈氏爱侄共存先生将珍藏多年的资料供我参阅，其中有陈敬贤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七年间给他兄长的亲笔函件，据说迄今仍少为学者所引用，非常珍贵，在我居星从事研究期间，陈共存君助理经

理林乃田、秘书符贵平二位也多方从旁协助，在此一并谢过。

崔贵强君也将他有关战后星华社会参与中国政务的作品提供给我；莊钦永君则不辞辛苦，为我收集国家图书馆内有关陈氏活动的报章资料；颜清湟博士则指示我如何应用 Wade-Giles 系统予汉文人名上；Dr. Claudine Salmon 启示我参阅陈氏在中国活动的各类著作；翁执中博士除供我参阅他本人珍藏的资料外，尚指示我前往英国Richmond之Kew市国家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说该馆收有大批新马战后政治史料，将有助于我的撰著工作。对于上述各位先生的仁风义举，我亦在此一一致谢。

陈嘉庚基金、李氏基金、澳洲 Research Grants Committee、澳洲 Flinders University Research Budget 等机构给予我财力上之鼎助，使是项研究任务得以顺利完成，我当然也不会忘记它们的贡献。

我亦要向南澳 Flinders University 历史研究室秘书 Mrs Joan Stephenson 致意，在打印原稿的工作上，她可表现了高度的耐性呀，尚有王赓武教授、龙田滋博士、Mrs R.B. McKenna、R. Boak、陈国庆、F. A. Charlton-Thomas 等诸位对拙著提供不少宝贵意见，尚此致敬。至于本书之疏漏、偏颇，理当由著者自负之。

杨进发
南澳大利亚
弗林德斯大学
1986年3月

导 言

我是在一九七六年开始酝酿写作此书的。在此之前，早有不少有关陈嘉庚的著作了。其中最为重要的，首推陈氏之自传《南侨回忆录》，此书于一九四六年在星洲出版，一九七九年又见香港推出再版本。全书三十万字，作者乃从三个主要领域着手阐述：三十年代期间个人的政治活动概况；个人所从事的社会与教育事业；个人企业之兴衰；惟三部分比重不均。此书无疑乃迄今为此东南亚华族移民自传本末最为赅备之作，亦为陈嘉庚乃至新加坡华人社会及中国整体政治研究者所不可或缺的参考材料。书虽洋洋洒洒，仍留下许多空白，如：他与英殖民当局产生摩擦嫌隙之来龙去脉及他的团体及实力地盘究竟何属等等。

《南侨回忆录》而外，陈嘉庚尚出版其他五书，如《住屋与卫生》（星洲·一九四六）、《民俗非论集》（星洲·一九四九）、《陈嘉庚言论集》（星洲·一九四九）、《我国行的问题》（香港·一九四六）、《新中国观感集》（星洲·一九五零）。《住屋与卫生》乃有关住屋与卫生间关系的论述；《民俗非论集》乃对民间各类习俗的评议；《陈嘉庚言论集》汇集其战后言论多篇，乃研究其战后政治思想之珍贵资料；《我国行的问题》阐明其改革中国交通问题之见解，其中亦涉及于星洲创设胶胎业之原由，颇为精彩；《新中国观感集》中多为一九四九年五月至一九五零年二月间回返新中国参观访问后之感想，极富参考价值。

一九五零年郑良在香港出版《陈嘉庚》一书，描述陈嘉庚反国民党之始末，书极单薄，纵述了陈嘉庚自一名亲国民党者到反国民党干将的转变过程，对他战后的一些活动做了不少有趣描绘，惟对他战后活动所取得的成就，却鲜有新论。

另一项研究工作是陈育崧率同厦大一批校友进行者，后结集成《陈嘉庚》一书（星洲·一九七零），惜仅供同人参阅而已，此书作者们于评估陈嘉庚之政治领

导与政治势力方面颇费一番心血，惟对陈嘉庚获得政治成就之原由，见解仍未见突破。尽管如此，其中二章曾将其战后活动述至一九六一年，不失为一项进步。

一九六二年北京出版了一册重要纪念特辑《陈嘉庚先生纪念册》，内收回忆及颂扬文章凡四十篇，并附不少珍贵图片，其中若干篇章针对陈嘉庚政治思想作了不少新的剖析，另外一些则将一九五零年后他在中国的活动情况作一番介绍，弥足珍贵。二十三年后，北京政府为配合陈嘉庚诞生一百一十周年之纪念活动，出版了纪念集《回忆陈嘉庚》（北京·一九八四），内收四十一篇纪念文章，执笔者多为其至亲挚友，吉光片羽，为他战后生涯的补充，足堪珍视。

中国自文革结束后也开始了两项重要研究工作，旨在认真探讨陈嘉庚在教育与政治方面所作努力及其成就。一乃陈碧笙、杨国桢合著之《陈嘉庚传》（福建·一九八一），此书涵盖面极广，着重阐述陈嘉庚在政治与教育事业方面的建树，并视陈嘉庚为一名中国本位之政治领袖、爱国主义者、资产阶级之进步代表。惟当论及陈嘉庚之公众生活时，此书不能提供当时星马历史与社会（社区）及政治（英国殖民统治）的充实资料，俾人们能够对他所作所为及所引致事件的前因后果有个全面了解，是这一本政治传记的最大不足之处。尤有进者，人们若指望从中获悉其本人乃至家庭、俱乐部、社区、社会与政治、实力地盘、敌友及英国人在其政治生涯与政治命运中所起作用等等详情，不免会大失所望。另乃王增炳、余网编著之《陈嘉庚兴学记》（福建·一九八一），是为一专题论集，篇幅较短，作者侧重于阐述陈嘉庚“教育立国”之思想及他为之努力贯彻落实的经过，并极力褒扬之，惟对他在星洲之教育努力，却着墨不多，仅有一章触及陈嘉庚在南洋教育方面的努力，未免失之偏颇。不过，在有关他与福建教育发展关系的所有著作中，此书乃体制最为完备者。

有关陈嘉庚的英文著作不多。波曼（HOWARD L. BOORMAN）编订的中华民国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纽约·一九六七）第一册对陈嘉庚作了简明的介绍，惟无新意，在数篇专门论述三十年代新马华人参与中国政事的文章中曾提及陈嘉庚，惟仍非其个人传记。^①日人阳石明至教授所撰《南洋中国民族救亡运动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堪萨斯·一九七零），也约略触及陈嘉庚在该时期所扮演之积极角色。综上所述，乃知陈嘉庚迄今仍不为英语世界所全面了解。

对陈嘉庚研究方面的各种著作作了一番简单介绍及阐述后，现在有必要阐述一下写作本传的初衷，也约略阐明我要将东南亚及中国历史上这么一位风云人物置于剖析框架上研究的原由，鉴于这是一位历史人物，我的研究当然不免会染上一些历史学及社会学色彩，故第一章乃溯至十九世纪新马社会及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第二章触及陈氏家族，先描叙同安区域之地理概况，人口及社会，经济情形，然后以集美为焦点，剖析所谓“同安精神”之成因，氏族渊源乃伴同人一并叙述的，欲洞悉陈嘉庚的社会与政治生涯，非先了解其经济地盘不可，此即第三章之主要内容。第四章指出，陈嘉庚于获得经济成果后，即通过输捐义举、兴学办校等活动，崛起而为帮及社会领导，确立卓越之社会地位。第五章阐述他与中华总商会、怡和轩俱乐部、新加坡树胶商公会、福建会馆及其他社团之关系，经观察乃发现怡和轩与福建会馆是陈嘉庚二大实力支柱，也即凭此，他方能于一九二八年后跃登政治领导地位。第六章侧重于综述其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零年间之政治生涯。第七章是讨论一九四零年到中国慰劳与视察之行对他的冲击与影响，也涉及一九四二至五年间避难爪哇前后之情景。战后其政治努力及回国后于新中国大地上之作为（一九五零年至一九六一年）等，乃与末章一一介绍之。本人乃刻意地将陈嘉庚置于此历史舞台中心，之后再招来一个个来头不小的演员与之对演，至于剧本，则以社会、政治为经，人为因素为纬串缀而成，旨在表扬此多面性人物的生动形象，让他显现出自己与当时急剧变化着的中国以及东南亚时代同呼吸、共奋进的情景。

职是以故，本人乃不揣浅陋，试图将这位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爱国者、长者，其一生理想、奋斗、成就及贡献重新剖解一番，且重新评估其对亚洲社会、经济及政治等方面之影响，此又未尝不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任务。

最后，仅就汉字人名地名事说一两句话，查东南亚华人姓名拼音久已习用，且受普遍认同，理应继续保留，无需将之罗马化。即为此，书中人物如陈嘉庚、林文庆、孙崇瑜仍保持为TANKAH-kEE、LIM BOON-kENG、SNG CHOON-yEE、而非CH'EN CHIA-kENG、LIN WEN-ch'ING、SOON TSUNG-yI。至若欠缺已沿用之英文名时，乃参照WADE-GILES制将之罗马化。

①见 Pang Wing Seng 《The “Double-Seventh” Incident 1937: Singapore Chinese Response to The Outbreak of The Sino-Japanese War》，东南亚学报，卷4，第2期，1937年9月，第269-99页。又见 Steven Leong 著 “The Kuomintang-Communist UnitedFront in Malaya during The National Salvation Period 1937-1941”，东南亚学报，卷8，第一期，1977年3月，第31-47页。

第一章 历史背景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一位享年八十七的伟人在北京辞世了。中国政府为报答他的丰功伟绩，特授予国葬仪式。前往吊唁者多为身份显赫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包括朱德、周恩来、陈毅、陈伯达、廖承志、董必武等。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及其他人士献上花圈并向其家属慰问。^①灵柩由专列运出北京，八月二十日抵集美，安葬在一座方圆八千七百八十九英尺的巨大墓园——鳌园。这一座壮丽的墓地，是他亲自设计的，园址也是他早已检定的，福建各地蜂拥而至的吊唁者，云集在集美通向鳌园的通衢小道上，人人皆怀抱着一个愿望：向这一位近代的，最令乡人引以为荣的伟大儿子陈嘉庚，致最后敬礼。追悼会在包括北京、福州、厦门、广州在内二十三个中国城镇举行，追悼活动一时也蔓延至海外华侨聚集的各大都市如香港、九龙、新加坡、仰光、椰加达、三宝瓏、万隆、泗水、巨港、坤甸、横滨、加尔各答、巴黎、利普芝（东德）等处。^②这种因一人去世而不能抑止的悼念热忱，在东南亚华人历史上，尚属首见。

一八七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陈嘉庚诞生在中国福建省同安县集美村。自一八九零年至一九五零年，他一住星洲五十余年，可以说，他一生中最健旺的岁月是在这儿度过的。

他生活在中国历史剧变的年代，也生活在东南亚社会与政治急变的年代，他见证了满清王朝的衰败、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兴衰及共产党领导下新政府的成立。他也目睹了，在日益抬头，不断茁壮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冲击下，东南亚，尤其是新马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日渐式微的情景。

故国也适逢在一片风刀霜剑中。在陈嘉庚诞生前二三十年间，清军在鸦片战争中（一八三九至四二及一八五六至六零）一败涂地，紧跟着是不绝如缕的农民起

义，其中较著名者为太平军、捻军及回军之起事。内忧加外患，中国老百姓损失奇重——四千万人丧亡，五口通商，农村经济凋敝，外货加鸦片，如潮涌入，面黄肌瘦之烟霞客比比皆是，一八六零年鸦片被规定为合法售卖使白银大量流出中国，国库顿呈虚空。

十九世纪初开始的军事化过程，导致地方割据局面及现代军阀主义的兴起。华南一带掀起的出洋热，给海外带来了大量的寻金客、寄身客。一个深受儒学熏陶的泱泱大国如今手脚受困，苟延残喘。

或者陈嘉庚会庆幸自己并没置身于上述水深火热中，然而，他与他同代人所过的生活，并不比前辈的强几许，十岁时，中法战争爆发，福州船厂被炮毁，中国南洋舰队被击溃，一八九四至五年中日在朝鲜开战，中国北洋舰队魂葬黄海，马关条约使台湾强让于日本，也赔了二亿两银子，一九四九年，陈嘉庚将是次事件之影响亲口陈述，他指出，当时，台湾，福建对外物物交换贸易受日本人一手垄断后，福建商人受到巨大打击，盖两地交往中断，人民自由往来受阻，闽南一带手工纺织业陷于全面停顿。^③在谈话中他也指出自己早已意识到日本的侵略本性 & 满清的无能保持领土完整，此次战争的痕印及屈辱条约，终于催生了日后为民族自强运动的爱国主义者。

中日战争后，列强步步进逼，夺占租地及广大各自的势力地盘，中国受瓜分之势已迫于眉睫，在列强争逐分肥的扰攘声中，中国北部爆发了义和团的起义（一九零零至一）。西方列强与东洋日本携手共进北京，中国的京城但见熊熊火光，起义被碾平，清廷俯首签订了辛丑和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予参战诸强，相当于清廷岁入的十倍。日俄在中国领土上大动干戈，清廷虽不曾介入，却蒙受池鱼之殃。欧战（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爆发之势日渐明朗后，西方列强无心恋战，助长了日本吞华野心，他们公然的及肆无忌惮的压迫也出现了。一九一五年，他们向北京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所谓“二十一条”，如果袁世凯接受各条款，中国将沦为日本之保护国，凡尔赛协议也给中国增添屈辱，因为贵为第一次大战战胜国，却要将德国人在山东之利益拱手让予日本。这一个耻辱事件引发了“五四运动”，历史学者迄今仍继续评估此次运动的影响。凡尔赛协议播下中日再次冲突的种子，一九二八年五月蒋介石北伐军在山东济南与日军的冲突既是。此次冲突导致两国关系的恶化，也为中日第二次战争（一九三七至四五）埋下伏线。在此场漫长战争中，蒋介石军队还撤退至西南方四川省之重庆市，让日军控制了中原美好山河。

中国与列强间所签署的一切条约，导致割地赔款，开放口岸，以为外货流入大开方便之门，也使中国人感到奇耻大辱，似此扰乱局面，任何冀图建设一个现代化中国的努力皆化为泡影。与之相反，它却使千百万头脑清醒之士，内心感到压抑，悲愤，爱国主义精神遂化为各种各样的思想方式在海内外呈现出来：自由主义、民主思想、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个深以文化为荣者怎能目睹“神州沦陷”而袖手旁观呢？

看起来仿佛外患频繁仍不足以挫伤中国人之心灵，辛亥革命虽推翻满清统治，接踵而至的却是一片政治对立、军阀混乱局面，为中国现代史谱写了最丑恶的一页。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七年间，军阀在中国大地上横行无忌，拉夫为辅，又陷人间于水火，大地上弥漫着一片灾难、不幸与失望。一九二七年始，国民党政府实行大清党行动，极力镇压与屠杀异己，实行恐怖与军事统治。老百姓欲安身立命，又苦于找不到一个能为他们带来和平稳定的，效能卓著的政府。政治对抗与武力镇压导致国家危机，出现了国共间的最大战役，第一次内战时期（一九二四至七），中共党人被捕监禁及枪决者，难以数计，许多被迫潜入地下。第二次内战时期（一九二八至三五），国民党军队对共军华中根据地进行了五次大围攻，引发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红军历经万苦千辛，跨越十二省份，最终抵达延安。最后一次内战（一九四六至九）的高潮是一九四八年及一九四九年，共军在东北、华北及华中发动了大反攻，蒋介石军队逐离中原，最后偏安台湾。内战绵绵，外债重重，其间中国广大人民生命与财物损失之巨，只有十九世纪中叶之农民起义足堪比拟。而中国广大人民内心痛苦与烦恼之深，却非笔墨所能形容。

除属于人祸之内忧外患外，中国也发生了现代史上规模浩大的数次天灾，苦旱、水患、瘟疫、饥荒，不绝如缕，而政治上的腐败无能，又使灾情无从减缓，更置灾民于水火中备受煎熬。一八九零年至一九四九年间所发生的自然灾害，激起了身居海外的富侨们的同情，^④他们挺身而出展开一系列赈济工作，各式各样的筹募活动如火如荼的展开。于是，在海外华人中之政治觉醒与追求中国富强维新的意愿之外，也衍生了一种道义激情与动力，此乃海外中国民族主义中一种比较温和的内蕴。

这一些漫长与剧化的中国民族危机，终于催生了一批又一批爱国志士。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等，皆殚思竭虑，尝试借助西方经验以结合中国实际来拯救国家于水火。这些领袖皆立足于政治前线，被誉称为“先知先觉

者”，他们在中国现在政治史上分别扮演着不同角色。陈嘉庚却不曾置身于这些政治风暴的中心，然而，举凡中国的一切社会、政治与权利的变动，始终不曾逃离他的注意力，也一再染化着他的政治意识，激励着他的政治行为。像其同时代无数的华族移民，当祖国当政者显得颠预无能时，他即陷入失望中，当国家濒临内战边缘时，他即陷入彷徨中，当国是乖离正道时，他即感到义愤填膺。作为一位关心国事，深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教诲者，他绝不能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因此，虽有千里河山之阻隔，英国殖民统治之束缚，陈嘉庚皆借助各种时机在国内国外进行一些和平的政治、社会改革的努力。

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虽然现代中国的政治命运一再熏染他的政治信仰，并指引他的政治行动，英殖民主义在新加坡的统治却一再限围着他所扮演的政治角色。而当转口贸易、自由企业所带来的经济与兴旺一再塑造他的温和改良主义思想时，新加坡华人社会与社区结构却不曾为他的社会与政治领导角色与志向设置任何难以逾越的障碍。

海峡殖民地政府开始时是向伦敦的宗主国负责的。迨一八六七年，它接受英国殖民部管辖，于是，在总督之下，遂有了一个立法议会与一个行政议会的产生。立法议会中有官委与非官委议员之分，非官委议员乃受当局委任者，在议会中居少数。行政议会人数不多，且全为英殖民政府官员。二十年代开始才有数名亚洲籍人士被挑选而进入行政议会，参与本殖民地一些决策工作。立法议会的职能是辩论，反映民意及立法，行政议会则专责贯彻所颁布之法令及有关殖民地的其他行政职务。凡有关海峡殖民地中华社的问题，则由华民卫护司署向总督提供咨询，最后由总督定夺，华民卫护司署成立于一八七七年，后改为华民政务司署。一八八九年，华民卫护司署成立华人参事局，委员多来自华社中之各个帮派，以聆取彼等之意见。^⑤殖民政府借助它来调谐或缓冲彼等与华社之歧见或紧张关系。

英殖民当局比较偏爱侨生华人，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他们绝大部分为英文教育者，又多为律师、医生、工程师、绘测师与会计师等专业人士。他们在培育下充当华社利益之发言人，使华社中之移民华人即嫉且恨。尽管如此，由于一九四五年以前，公民权与议会民主仍未见存于新加坡，这些英皇子民在政治动力上作为有限，另一方面，由于移民华人继续仰赖中国方面之指示与声援，这种态度造成殖民统治下华社欠缺真正动力的一个不能推卸的责任。这一种现象，加上英殖民地主义者对华人社会文化与语言的漠视，致使一些优秀的侨生专业人士及学者

如辜鸿铭（一八五六至一九二七），伍连德及林文庆（一八六九至一九五七）等先后返国服务。^⑥

英国人与东南亚所有西方殖民主义者无异，他们素来即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在星马的政治权益，并且抗拒在思想上、政治上真正的或想象的“颠覆分子”。他们颁行社团注册法令以驭控社区行动。他们视为“颠覆”及危害法制者如华人私会党、国民党分部及后来之马共及其细胞组织等，一概被封禁。同样的，那些触及“刑事”或“政治”罪行者，如参与“非法”团体，一律被捕入狱或押解出境。英国人利用这种严峻政治手段，如培植一群更令人“接受”的社区政治领袖，即一种思想上温和、行动上属改良性的政治领袖。此外，英国人对华社中领导人物的合作者与守法规者也比较宽容，让他们从事亲中国的社会政治运动并对他们的行动“合法化”。陈嘉庚之被视为此类“合法化”领袖，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熟识转寰之术，也随时准备在不逾越殖民地法律框框的情况下从事社会与政治工作。

殖民主义者另一种比较委婉的统治手法，是对思想意识的操纵。这一种方式是通过报章、邮件检查及教育监督等途径积极进行的。邮件检查旨在遏阻“颠覆性”思想的传播，所谓“颠覆性”思想即指反西方、反英民族主义及共产主义思想等。一九二零年颁行的学校注册法令，旨在加强对海峡殖民地及马来联邦华文学府的控制。法令授权个别教育部门可以政治或思想信仰为依凭来对待学校之申请或教育职员之取舍。同样的，在一般情形下，只有“颠覆”思想之华族人士，亦不能接受为认可的社区或政治领袖。在新马社会，一种急近昂奋、多姿多彩的政治领导方式，即在英国当局的这种种思想限制下，受到进一步的阻碍了。在战前马来亚，陈嘉庚之社会、政治思想之所以能大部分地为英国人接受，基本原因乃在于，它是导向于反对日本侵略华的。尽管如此，由于英国人在中日战争中始终保持一种“中立”态度，他们之间的关系亦一度呈现紧张。战后时期由于英国人始终与蒋介石政权保持友好关系，乃与不断抨击蒋介石的陈嘉庚出现了类似的紧张局面。

与政治上及思想上的严峻控制相比，英国人在经济政策上却显得开明多了，他们极力鼓吹自由竞争与发展个人企业。这种开放的经济政策激发一些勤奋华侨努力积累资本，并投资于星马各个经济领域中。英国人自一八七四年始即介入烽火处处的马来联邦，平息战火并恢复治安，为新马资本之涌入马来半岛铺平道路。中国与印度劳工的大量涌入加上中国人投资于海峡殖民地中风险巨大的一些项目，也

促成了二十世纪时马来联邦商业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这两项工业活动也促进新加坡之转口贸易，为它日后崛起为东南亚各国之贸易总汇、金融中心，扎下牢固的基础。华人在私会党保护下通过廉价劳工在采锡业中赚取巨额利润，复将此笔巨资投向银行、保险、制造及船务业上，并在本世纪初与欧资企业在出入口贸易上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竞争。

陈嘉庚有幸置身于这种有利的经济环境中，立足于新加坡这么一个允许勤力、精明、目光远大、坚忍不拔的人获取财富、名望乃至社会地位的地方。他攫住机会使自己于一九一一年成为百万富翁，旋于欧战结束时成为超百万富翁。有了大量财富，他才能够，也愿意为叻闽二地做出了社会与教育方面的巨大贡献。他在自传《南侨回忆录》中坦言，若非获致足够资财，自己一生的社会政治事业乃无基石。^⑦

一八一九年后之新加坡社会虽已为多元民族所共处，惟其自由港地位及英人之开放政策，却引来了中国沿海一带的大量移民，使马来人口在比例上急剧下降。自一八六零年开始，新加坡华族人口已凌居上风。一九二一年，在三十一万五千一百五十一名全部华族人口中，移民占七十五巴仙。十年后，全岛四十一万八千六百名华族人口中，移民比率降至六十四巴仙。至一九四七年，移民压倒侨生华人的形势才扭转过来。按该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在全部七十二万九千四百七十三名华族人口中，侨生者占据了六十巴仙。即使是在这个比较晚近时期出生的华人，大多数仍然是接受华文教育、口操华语者，他们在文化上、在思维方式上一般还是倾向华侨社会的。

不过，总体上说，与华侨社群相比，侨生华人的思想与生活方式都是比较西化的。他们在更大的华人社群中，也是比较现代化的一群。侨生华人社群一路来亦能培养一批批能力卓著，德高望重的领袖，为殖民当局所认可。由于口操英语，大多数乃被聘为公务人员、当行政长官、书记或其他职位。他们也在私人机构，尤其是在银行、保险公司、船务公司及洋行中任职。众所周知，侨生华人之最大的愿望乃充当买办，即成为欧资银行、洋行与公众之中介人。在商场上，他们一样长袖善舞。二十世纪数闻人如林文庆、李俊源（一八六八至一九二四）、林义顺（一八七九至一九三六）及其他几位，乃当地一些银行、保险公司及企业的创办者。或者是为着吸取一些华侨资本以支持自己的新投资吧，他们与华侨社会首领与资本家频频合作，共同推动与华侨社会利益相关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活动。